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五期／民國 99 年 9 月／頁 107～152

德意志獨特道路的回聲？
——關於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

陳宜中**

摘　要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的思想界，某種把「西方式」民權主義打成異己的國族主義話語，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此種「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把「西方式」民權主義相對化、他者化爲外於中國，而且是中國必須拒斥的西方價值、西方污染。本文引入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及所謂的「德意志獨特道路」以作爲中國的借鏡。形成於十九世紀初的德意志國族主義，不但正是一種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而且正是此種（西方）國族主義範式的始作俑者。在第二帝國時期，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正是佔統治地位的「德意志意識型態」。本文論證指出：無論是昔日德意志的原版，還是今日中國的再版，此類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的國族主義言說皆值得商榷。其危險在於：助長內政的集權化、國權的不斷上綱，阻礙漸進的民權主義改革，進而在危機時刻失控，爲之付出沉重的代價。此外，其以「霸道的西方」（不受制約的國權與國族主義）壓制「爭民權的西方」的言說傾向，也很難自圓其說。本文以昔日德國作爲今日中國的前車之鑑，並反思其意義，以期避免馬克思所謂「鬧劇」的重演。

關鍵詞：中國、國族主義、民權、西方、德國

---

* 本文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所主辦之「政治秩序與道德秩序：現代性的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2010 年 4 月 29-30 日）。作者感謝王超華教授的評論和指正。兩位匿名評審提供寶貴的修正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通訊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E-mail: ic10006@gate.sinica.edu.tw。

收稿日期：99 年 4 月 20 日；通過日期：99 年 8 月 11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國際地位的提昇，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及其「獨特性」的議論也與日俱增。國際輿論界興起了一波中國熱，至今未歇；甚有論者預言中國將要統治世界（Jacques, 2009）。[1] 在中國內部，謳歌盛世、讚揚「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學者文人所在多有，歌功頌德之聲不絕於耳。

「中國獨特道路」、「中國特色發展模式」及其類似話語，不免讓人聯想起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保守派人士所稱頌、且爲之感到驕傲的「德意志獨特道路（*Sonderweg*）」。後者的特色被認爲在於：它是一種國權至上的國家主義道路；其威權統治者在追求經濟成長、富國強兵的同時，以國家統合主義式的手段，壓制、收編由下而上的民權訴求和政治改革壓力，因而使德國免於遭到西方式民權主義（理解爲一種極不可欲的西方污染）的逐漸同化。[2]「德意志獨特道路」或如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920）所形容，是一種奮力抵抗西方式民權主義的、威權主義式的、保守主義式的「普魯士〔國族〕社會主義」，而非追求政治平等與社會平等的民主社會主義。[3]

中共以西方傳入的黨國體制力行官僚資本主義，並獲得傲人的經濟成長，此種「低人權的發展道路」的確相當特殊。[4] 但展望未來，中國又是否該逐漸轉向一種與民權保障、憲政法治相容的發展路徑？這無疑是許多

---

1 另見 Perry Anderson (2010) 的相關評論。

2 參見 Buse and Doerr (1998: 934-935)、Burrow (2000: 138, 145)。「德意志獨特道路」先是第二帝國時期保守派論者的褒揚之語；但在二戰以後，有些西德史家如 Hans-Ulrich Wehler (1985) 將此概念引入第二帝國的史學研究，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批判「獨特道路」之問題性格。此外，亦有馬派論者如 Blackbourn and Eley (1984) 認爲「獨特道路」並不存在。關於此間爭議，另見 Evans (1989)。

3 史賓格勒筆下的普魯士國族社會主義，所指的還不是納粹的國族社會主義。前者之提出（1920 年）要早於後者。另見 Farrenkopf (2001)、Woods (1996) 論史賓格勒。關於民主社會主義，另見 Sassoon (1996)。

4 關於低人權發展道路，另見秦暉的分析，見陳宜中（2010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所關切的重要課題。有些論者把廣義的民權主義訴求（公民權利的保障、憲政法治等）形容爲「普世價值」，意指中國有理由、也應該接受已廣受世人肯定的民權（或人權）建設。然而，中共有可能展開漸進政治改革，以逐漸落實憲政法治，逐漸釋放由下而上的輿論監督與民主力量，逐漸還權於民嗎？從晚近的政治發展趨勢來看，這恐怕不容樂觀。

儘管北京奧運以「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夢想」作爲標語，但自二〇〇八年起，官方及親官方人士對「普世價值」（指「西方式」的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等）展開了高調的批判。[5] 這類以「中國模式」聲討「普世價值」的言說，多把普世價值相對化爲「西方價值」、「美國價值」、「西方自由民主」、「美式自由民主」，並藉此暗示或明指：民權主義者是要「照搬」西方經驗，是受到西方精神污染的西奴，甚至是美國派來顛覆中國的特務。此種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在二〇〇九年到達高峰後，一路延續至今（cf. 錢理群，2010：14-16）。

北京奧運後，政治緊縮的態勢愈發明朗，且愈演愈烈。顯現爲更嚴厲、更不公正的鐵腕維穩，言論自由和法治狀況的倒退，「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之濫用，以及〈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的十一年徒刑等。[6] 維穩部門下達「先發制人」的指令，務期消滅「不穩定因素」於未然。新一波擴大化的「國保」（情治、特務）與「安全」工作，對互聯網在內所有資訊流的監控升級等，已如火如荼地展開。在盛世的表象下，是穩定壓倒一切的「嚴打」。[7]

國族沙文主義的抬頭、對普世價值的圍剿、對民權改革的拒斥、黨國體制的再集權化等，這一發展趨勢不免令人擔憂。錢理群表示：

> 我們所擔心的，正是〔蘇聯的〕歷史可能〔在中國〕重演：當中國因爲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自身經濟的發展而陷入民族狂熱，猛批普世價值，拒絕向西方學習，並肆無忌憚地強化黨國體制，以爲

[5] 參見朱學勤（2009：23-29）的評論。率先對普世價值展開批判的是《人民日報》集團下的《環球時報》；首見於潘維（2008）。

[6] 關於〈零八憲章〉，參見李曉蓉、張祖樺編（2009）、江迅（2008）。關於劉曉波遭判刑十一年，另見錢永祥等（2010）的座談會發言。

[7] 參見于建嶸（2009）、賀照田（2007）論胡溫體制下的維穩邏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這是在發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那就實際上在把自己推向未來的深淵。——這絕非危言聳聽。

在一九三〇年代，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大蕭條，蘇聯的經濟一枝獨秀。於是，斯大林「拒絕對自身體制的反省，也拒絕學習西方的經驗，並進而強化實際上已經弊病叢生的專制體制，肆無忌憚地進行內部大清洗，……這正是五十年後蘇聯瓦解的最早的起因」（2010：13）。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接受錢理群的以上見解。近年來在中國的思想界、智庫界與知識界，某種把「西方式」民權主義打成異己的國族主義話語，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此種「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把「西方式」民權主義相對化、他者化爲外於中國，而且是中國必須拒斥的西方價值、西方污染。這是一種以西方（民權主義）作爲抵抗對象，同時「自我東方（專制主義）化」的國族主義言說，帶有強烈的國族浪漫主義、國族沙文主義傾向。其言外（或言內）之意是：捍衛中共所領導的中國道路及其獨特性，即是堅持中國主體性，反之亦然。[8]

針對這類言說，林毓生（2010）曾提出以下質疑：

> 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內（包括不少政府官吏與普通國民），有一種說法，否認公民權利是普世價值。他們認爲公民權利的論證源自西方，非中國所固有，所以中國人不必接受西方的價值。此種說法，事實上，是庸俗的歷史命定論，稍一分析，便看出它的荒謬之處。中國傳統之中發展出來的數學，基本上是代數，幾何本來不是中國固有的東西。難道現在中國人所有正面接受的東西，都必須是中國過去所固有的嗎？答案不言而喻。我們接受的東西，並不必然非最初源自自己的歷史傳統不可。只要我們嚴肅地面對自己的問題，根據自己的需要，一項理念、價值與體現這一理念與價值的制度，即使源自另一傳統，當然也可接受。各個文明交流史中的例子，比比皆是。

若謂「源自西方」就是斷然拒絕的理由，中共黨國體制不也源自西方？國

[8] 參見潘維編（2009）、潘維（2009）、汪暉（2010）、王紹光（2009）、張旭東（2010）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族主義不也源自西方？國權至上的學說不也源自西方？若凡事皆以「源自西方與否」作爲取捨判準，焉能不淪爲（反）西方的奴隸？

本文是關於當前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的一篇論文，但其主要目的不在於全面探討這些言說，而在於引入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及所謂的「德意志獨特道路」以作爲中國的借鏡。形成於十九世紀初的德意志國族主義，不但正是一種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而且正是此種（西方）國族主義範式的始作俑者。當前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與昔日德意志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實有諸多近似之處。其所歌頌的「中國獨特道路」，與昔日「德意志獨特道路」亦有顯著的親近性在於：爲了富國強兵，爲了趕超西方，兩者皆以國族主義、國家主義作爲統治利器；但對於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日漸增強的民權主義要求，卻始終抱持著強烈的敵對、抵抗態度，視之爲妨礙其大國崛起的西方污染。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時代，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正是佔統治地位的「德意志意識型態」。可以說，它助長了內政的集權化、國權的不斷上綱，阻礙了漸進的民權主義改革，進而在危機時刻失控，爲更極端的法西斯主義提供了契機。本文以昔日德國作爲今日中國的前車之鑑，並反思其意義，以期避免馬克思所謂「鬧劇」的重演。

本文後續各節的主要內容如下：首先，對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及其相關課題，提出一些基本考察（第二節）；接著分析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的主要命題（第三節），及其與第二帝國時期「德意志獨特道路」的關聯性（第四節）；然後以此作爲參照，回過頭來對當前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及其「中國獨特道路」言說，進行反思與商榷（第五節）；最後總結全文（第六節）。

貳、西方與反西方

薩伊德（Edward Said）在他的名著《東方主義》中，分析西方論者是如何把「東方」建構爲落後、不理性、女性化的「他者」，從而肯認其西方「自我」的優越性。在他看來，這些帶有族群中心主義或種族主義偏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知識「話語」，與西方強權的殖民和帝國主義「行動」很難分割。[9] 但另一方面，薩伊德高度肯定西方的人文主義傳統，並從「啓蒙」與「解放」界定他的政治倫理。他譴責後現代主義式的、或國族沙文主義式的道德相對主義，及其所隱含的唯權力（意志）主義。儘管他強力批判西方霸道及其霸道話語，但從未倒向「逢西必反」的極端國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Said, 2004: esp. 10, ch. 5）。

薩伊德的啓示在於：所謂的「西方」並非鐵板一塊；而批判西方霸道及其霸道話語，跟以「反西方」之名爲惡的極端國族主義，亦非同一回事。這個道理，卑之無甚高論，似已不需重申（cf. Sen, 1999；2006）。但在現實世界裡，特別是在一些曾受害於西方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的社會，由於受屈辱的烙印仍相當之深，這使得後殖民或獨立後的本土統治者，仍經常得以利用反西方的國族情緒以鞏固其統治。其對西方霸道的批判，往往指向本土社會的內部，成爲對內整肅異己的便宜處方。例如，毛澤東即曾以清除西方資產階級勢力之名，發動了數次政治大清洗。

在曾經遭到西方帝國主義凌虐的地區，「以西方作爲他者」往往是其國族主義言說的一項主要特徵——中國亦非例外。可以說，「以西方作爲他者」實「內在於」一百多年來所有的中國國族主義話語，及其對政治自主和文化自主的要求。時至今日，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中國已成爲舉足輕重的世界大國，而這爲中國社會帶來了極強的民族尊嚴感。於是，很自然的，種種新興的文化國族主義與政治國族主義話語也開始抬頭。其中，既有許多饒富意義的討論和辯論，但也有些發展趨勢是特別值得商榷的。

就中國國族主義而言，「以西方作爲他者」的維度一直存在，而其所召喚出的「對政治自主和文化自主的追求」也一直是重要命題。然而，這些自主性要求的具體所指，及其現實意涵爲何，向來人言人殊。譬如，在儒家倫理的課題上，一直有不少文化保守主義者（和／或相對溫和的文化國族主義者）主張：儒家倫理可以、也應該與政治民主、民主憲政並行不悖。[10] 但也有些文化國族主義者認爲：政治民主註定與文化傳統相衝突。

---

[9] 參見 Said (1978)。另見 Said (2003)，以及 Blaut (1993)、Young (1990)、Harootunian (2004) 對西方霸道話語的批判。

[10] 參見牟宗三（1983）、余英時（2000）。另見殷海光（2009）晚年的陳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 在此，「文化自主究竟意味著什麼？」而非「文化自主是否值得追求？」才是爭論的重點。縱使文化自主性言說都存在著「以西方作爲他者」這一維度，但其具體的內容卻不盡相同，甚至南轅北轍。

易言之，對文化自主和政治自主的追求，未必非得去鑽原教旨主義的牛角尖。劉擎（2009：22-23）指出：

> 中國在政治意識形態、文化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安排、經濟生產方式、公共傳媒與通訊，乃至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方式等所有層面上，都已經與所謂「西方」世界發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與糾葛。因此，一個僵化的「中國」對「西方」的二元對立框架已失去了其現實經驗基礎，失去了有效的解釋力。今日之中國是一個過於複雜的歷史進程的產物，存積著無數彼此交錯、相互糾纏的歷史痕跡。中國古代與近現代的文化因素，以及西方多種不同的思想理念，都「共時性地」構成了我們生活實踐的地平線，成爲當今中國之自我理解的內在的「構成性」（constitutive）部分。

爲了富國強兵，爲了趕超西方，中國實已接受了許多源自西方的現代性要素，包括國族主義、現代國家、工業資本主義等。正因爲「這些重大的變遷與發展使得一個傳統的、本真的和明確純粹的中國不復存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對文化自主和政治自主的追求，很難再仰賴簡單化的「中西」、「體用」等二元對立（劉擎，2009：22）。原教旨主義式的國族想像的主要問題在於：即因其「已失去了其現實經驗基礎」，它往往想藉由現代國家的力量以兌現其國族想像，於是淪爲一種政治反動主義，或被威權統治者利用爲壓制、清洗「西方污染」之藉口。

時下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或可稱得上是一種帶有原教旨主義傾向的國族主義言說。它把西方式民權主義（泛指西方式的民權保障、憲政法治、自由民主等）界定爲外於中國，而且是中國必須抵抗的西方價值、西方污染。近年來隨著中國的經濟崛起，它進而與「中國獨特道路」話語相結合，並展露出強烈的政治反動色彩。照其主要說法：當前「中

[11] 參見劉擎（2009）、許紀霖（2010）的相關評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模式」、「中國道路」的獨特性（乃至優越性）在於：中共黨國體制的英明領導，其對西方式民權主義的拒斥，其所體現的中國性與中國價值，其自我糾錯的中國式民主機制，其集權爲民的卓越國家能力，等等。[12]

歷史地看，「反西方式民權主義」在中國並非新穎主張——因其承襲自毛澤東時代所謂的「反資產階級民主」、「反資產階級法權」乃至鄧小平時代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以降，在中國新左派與自由主義的論爭當中，部分新左派論者如汪暉和王紹光，即已展現出對「西方式」民權主義的強烈排拒態度。[13] 王紹光宣稱：中共黨國體制所體現的中國式民主，不但有別於「權利本位」的西方式民主，而且比後者更民主、更優越。[14] 汪暉在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啓發下，從「反現代的現代」界定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的屬性，意指後者是一種反抗西方現代性的中國現代性。在汪暉的筆下，德意志國族浪漫主義話語經由竹內好的中介，與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社會主義傳統嫁接了起來。[15] 在此種反西方的國族（社會）主義話語之中，西方式民權主義從一開始就被定位成是中國必須極力抵抗的西方現代性。在此，中國通過對西方現代性的抵抗，而「自我東方主義化」和「浪漫主義化」了。中國浪漫主義式的國族真我，於是建立在對西方現代性、西方式民權主義的抵抗之上。

毋庸置疑，國族主義是西方現代性最重要的向度之一。比起西方式民權主義，西方式國族主義是更加強勢的一股現代力量。然而，西方式國族主義卻不是汪暉、王紹光等論者所要抵抗的西方現代性。反之，對中共黨國體制構成改革、轉型壓力的西方式民權主義，才是其最主要的抵抗標

---

[12] 參見潘維編（2009）、潘維（2009）、汪暉（2009b；2010）、王紹光（2009）、張旭東（2010）等。這類論說汗牛充棟，以上僅是筆者認爲較具論述深度者。浮泛化、庸俗化的「反西方」及「中國特色」話語所在多有，族繁不及備載。

[13] 關於 1990 年代後期以降的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爭，參見許紀霖、羅崗等（2007：362-398）所收錄之代表性文章目錄；羅崗、倪文尖編（2000）第二、三卷；李世濤編（2000）第三冊；王超華編（2004）。另見高力克（2007）的評析。

[14] 參見王紹光（2007；2008；2009）。另見陳宜中（2009a）對中國新左派民主觀的批評。

[15] 參見汪暉（2000），另見汪暉（2008；2009a；2009b；2010）。竹內好的思想及其國族浪漫主義傾向，非本文以有限篇幅所能深究，請見竹內好（2005）、孫歌（2001）；另見 Sakai (1997: ch. 5)、子安宣邦（2004：ch. 11）的相關評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汪暉表示：「中國的革命過程有其獨特的道路，中國的建設也在探索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中國政黨與國家有一種獨立的品格，因而也發展了一種自我糾錯機制」。[16] 不過，何謂「自我糾錯」？何謂「獨立的品格」？此類國族浪漫主義式的措辭，一方面把民權主義相對化、他者化爲必須抵抗的西方性；但與此同時，卻把西方傳入的中共黨國體制「浪漫化」爲中國獨立自主的唯一承載者，甚至就是中國國族「自我」的化身。其所謂的「自我糾錯機制」，若是放在中共再集權化、強力鎮壓維權人士及活動的脈絡下來看，不免顯得十分可疑。

早在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者就已經發展出了這類反西方的浪漫主義話語。對於國族浪漫主義者來說，國族主義作爲政治正當化原則，不僅要求「民族與國家的界線同一」，還必須追求某種「國族真我」的實現。柏林（Isaiah Berlin）把浪漫主義的邏輯表述如下：

> 我依照某些價值行動與生活，並非因爲這些價值是但凡心智充分發展者都具備的理性所發現……非也，我依照這些價值生活，不是因爲它們是普遍價值，而是因爲它們是我自己的價值，它們表達我特殊的內在……簡言之，我可以說創造了我自己的價值（2004：318-319）。[17]

二十世紀以降的狹隘國族主義者，經常在自知或不自知的情況下，使用「我就是我」、「做真正的自己」這類典型的浪漫主義話語。由於國族浪漫主義不承認任何「外於國族真我」的更高的道德或政治原則之存在，因此，對它的任何質疑往往在第一時間，就被它的自我正當化邏輯給相對化、他者化掉了。以國族浪漫主義話語把民權主義打成「西方污染」，同時樹立起一種免於一切「外在」批評的、浪漫主義化的、自戀主義式的國族自我，正是德意志國族主義者的發明。

近年來，與此相似的思維模式及其背後的感覺結構，可謂「瀰漫於」中國的狹隘國族主義話語之中。張旭東試圖引進德意志國族浪漫主義，包

[16] 參見汪暉（2009b），另見汪暉（2010）、王紹光（2009）、潘維編（2009）、潘維（2009）。
[17] 另見 Berlin (1996; 1999; 2000) 論浪漫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括其對「西方式」民權主義的拒斥，以作爲中國的效法對象。[18] 此外，亦有不少其他論者致力於「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之建構。這些個別論者及其各自論說，非本文所能深究。時至今日，「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話語已變得相當大眾化、浮泛化，遂有不少人毫不批判地接受或呼應之。[19] 而事實上，由部分新左派、國家主義、後現代、及文化國族主義者所共構的「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及其相關的「中國獨特道路」、「反西方現代性的中國現代性」、「拒當模仿西方的優等生」、「不該被西方話語給病理化」、「反西方式民主的中國式民主」、「拒絕歷史終結」、「走自己的路」、「抵抗西方的政治國族與文化國族」、「中國的世界歷史使命」、「中國價值的普世化」等說法，皆具一定的意識型態吸引力——即因其直接訴諸中國受西方欺壓、渴望獲得世人承認的國族情感。[20]

和昔日崛起時的德意志國族主義話語相呼應，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有以下幾項主要特徵：反西方式民權主義；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國權崇拜；趕超西方的強權欲望；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際觀；國族浪漫主義；有機的、和諧的國族共同體想像；國族社會主義式的（而非民主社會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宣稱；把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歸罪給西方（而非黨國體制）；聲稱要超克西方現代性，等等。此外，其所謂獨特的「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亦與昔日的「德意志獨特道路」有著一定的可比性。在後續各節中，這些所謂的「家族親近性」（family resemblances）將獲得進一步說明。

錢理群表示：最近一波的國族主義、國家主義潮流，在二〇〇八年主要是民眾情緒的發洩；但到了二〇〇九年則是知識份子登場，「圍繞『總

---

[18] 參見張旭東（2005；2010），另見蕭高彥（2006）的評論。

[19] 在此值得強調，本文所謂的「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話語，並不等同於官方的意識型態話語。後者仍具一定的彈性，而在「普世價值」問題上，中共高層亦發表過互相衝突的說法。可以說，「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話語也在競逐中共官方的支持。關於中共官方意識型態話語的晚近演變，請見王超華（2010）。另見江迅（2008）關於普世價值爭論的報導。

[20] 汪暉、王紹光、張旭東是較具思想體系的「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論者。此外，甘陽、崔之元、黃平也經常被提起，但本文不擬特別論及。另見黃平、崔之元編（2006）關於「北京共識」的陳述，並對照潘維編（2009）所提倡的「中國模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建國六十年經驗』展開，於是，就有了『促進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的理論概括』和『促成中國學派在國際學界的興起』的任務的提出」。他指出：

> 許多論者筆下的「中國發展奧秘」，他們總結、概括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都集中在：「中國六十年不變的強政府」，「有效的政府」，「具有超強意志的國家政權」，「有權力和社會權威存在」，「與其他國家相比獨一無二的中央集權」。而且不約而同地賦予這樣的強政府、強勢國家以各種特別美妙的功能和特點……這樣，最後概括出來的「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也就是所謂的「集權爲民」四個字。……〔這和〕胡溫體制的基本特點（一面強化黨和政府對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社會的全面控制，即建立超強政府，一面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驚人一致的（2010：14-15）。

這種「中國獨特道路」話語，就其效果（甚至意圖）來說，明顯是在爲現行黨國體制（及其最近一波的再集權化）服務的。此外，在「向西方挑戰」這點上，這些國族主義、國家主義論者是「一致並自覺的」：

> 本來，反對西方霸權，包括話語霸權，是有合理性的……但如果因此而擺出「向西方挑戰」的姿態，進而拒絕向西方學習，進而批判普世價值，或者認爲只有「中國模式」才具有普世性，這也是過了線。而在某些學者那裡，還走得更遠：凡是對現行體制提出質疑、批判，都被認爲是西方影響，西方滲透，是用西方的價值觀來醜化中國，顛覆中國……這樣，就只剩下一條路：對中國現行體制與中國黨和政府，高唱「就是好，就是好」了（2010：15-16）。[21]

在毛澤東時代，類似的「反西方」話語及其所正當化的政治暴力，是帶血的。如今，中共面對其激進的發展至上主義（一種異常激進的市場斯大林主義）所造成的社會危機，主要是以大棒（鐵腕維穩）和胡蘿蔔（有

[21] 另見錢理群（2009）對當前中國問題的分析，以及陳宜中（2009b）的錢理群訪談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限的民生改善）來因應，從而延續其低人權的發展至上、維穩至上道路。[22] 在此政治脈絡下，猛批「普世價值」，爲「中國道路」大唱讚歌，利用反西方的國族情緒來強化黨國體制，並爲「嚴打」提供正當性——這些都是「再集權化」的方方面面。而許多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論者，不但是有意識地在爲黨國體制服務，更是自覺地在扮演清除「西方污染」的理論先鋒。

從北京奧運前的三一四西藏騷動及奧運火炬事件，我們亦不難察覺：當前中國的國族尊嚴感時而伴隨著嚴重的沙文主義傾向。[23] 在官方主導的宣傳口徑下，西藏政策彷彿萬無一失；錯都錯在海外藏獨運動，以及西方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對西藏有著『香格里拉』的錯誤幻想」等等。[24] 這類以「抵抗西方」之名，轉移、遮蔽內部問題的國族主義言說，當然不是中國的特有產物。以「抗外」作爲藉口，對內壓制民權，毋寧是現代國族主義（不分中西）的基本傾向之一。但差別在於：在某些國家或地區，這種傾向多少還受到一定制約；但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卻未必如此。很不幸的，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的國族主義言說，只會進一步助長不受監督制約的國家權力的濫用。

進而言之，以「反西方」之名拒絕公民權利，其實很難自圓其說。畢竟，「反民權的國族主義」不但源自西方（十九世紀德國），還正好是西方現代國族主義範式之中較有問題的一種。在昔日德國，這一國族主義範式幾已發展到爐火純青、博大精深的地步，後來遂成爲日本極右派的仿傚對象。一九三五年，一群日本預備役軍官怒責東京大學的美濃部教授（主張自由民權的法學家）：「不是日本人，褻瀆神明，崇拜歐洲的意識型態，忽略了我們三千年的傳統和普遍的理想。這種自由主義會把我們變成西方蠻夷，這就是美濃部的基本信仰」。所幸，美濃部逃過了日本法西斯的顛覆罪，但著作遭禁，並被迫辭去東大教職和議會席位（托特曼，2008：371）。以史爲鑑，當前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最欠缺反思和自覺之處或許正

---

[22] 參見陳宜中（2010b）的相關分析，及（2010a）的秦暉訪談錄。

[23] 最近一波的國族沙文主義暢銷書包括宋曉軍等（2009）的《中國不高興》、摩羅（2010）的《中國站起來》。更早的、以《中國可以說不》作爲象徵的 90 年代狹隘國族主義，請見樂山編（2004）所收之評論文字。

[24] 參見汪暉（2009a：200-231）單方面批判西方人對西藏有幻想的愛國主義論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於：其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國族浪漫化、政治美學化的思維慣性，與昔日侵略中國的日本法西斯及其思想同路人，有著諸多異曲同工之處。[25]

綜上，對西方霸道及其霸道話語的批判，及其所對應的自主性要求、人性尊嚴要求，是有合理性的——但此與原教旨主義式的「反民權的國族主義」並非同一回事。柏林表示：國族沙文主義往往源自「人性尊嚴受創或受辱」，故有其「承認不足，要求承認」的人性需求及龐大動力（2004：330-335）。換言之，其問題不在於追求承認，而在於追求承認的方式出了問題。「反民權的國族主義」傾向於把「國族大我」、「國族真我」、「國族尊嚴」、「國權」不斷上綱、無限合理化，乃至於把其他種種反羞辱、爭尊嚴、要求平等化（equalization）的民權訴求，當成是必除之而後快的「體內污染」（西方污染、不穩定因素等）。但這種壓迫往往必須付出很高的社會和政治代價，卻未必能換來真正的「國族尊嚴」和「承認」。以下，我們將轉向十九世紀的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

參、德意志國族主義（I）：主要命題

自十九世紀末起，早期的法西斯主義思想與運動在歐洲（特別是法國和德國）即已萌芽。此後，歐洲國族（及帝國）主義之間的惡鬥、一次大戰、俄羅斯革命、乃至一九三〇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更爲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提供了助因。在德國，這最終導致納粹的侵略擴張，及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很自然的，國際學界在反思納粹經驗的同時，也把視野擴及到納粹以前的德國歷史，包括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的思想史與政治史。

以下，我們將以此作爲思想資源，評析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的主要特徵，特別是其反西方、反民權的面向；然後在下一節裡，以俾斯麥任內的軍事官僚專制爲例，探討思想與現實之間的關聯性。這些討論不擬、也不可能深入細節，其目的僅在於以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作爲參

[25] 參見丸山眞男（1984）、Maruyama (1963)、鶴見俊輔（2008）、子安宣邦（2004）、Harootunian (2000)、Najita and Harootunian (1988) 論二戰時期及戰前日本的思想狀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照，帶入反思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的另一種視角。

形成於十九世紀初的德意志國族主義，實爲一強韌的思想與政治傳統。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它更是佔有統治地位的「德意志意識型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用語），爲俾斯麥式的軍事官僚專制以及「德意志獨特道路」提供了正當性。[26] 它不但正是一種反西方、反民權的（西方）國族主義，而且稱得上是此種國族主義範式的創始者。柏林所謂的國族浪漫主義、國族自戀主義，其發源地正是德國。[27] 而其最深刻的哲學演繹幾乎也都源自德國：從十八世紀末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文化民族主義、民族浪漫主義，[28] 到十九世紀初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黑格爾的政治國族主義，[29] 到蘭克（Leopold von Ranke）、特來區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的歷史主義，[30] 到華格納、尼采對西方現代性的批判（cf. Hollinrake, 2010），直到二十世紀的史賓格勒、容格（Carl Gustav Jung）、施密特、海德格爾，[31] 等等。

一七八九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除了要求平等的市民權（或人權、法律平等）及適用於布爾喬亞的公民權（或政治平等），還是一場爭共和、反王權、追求國民地位平等的國族主義革命。但一七九三年左右，革命變了調，革命軍開始出征。後來取得政權的拿破崙以「推廣法國所代表的普世文明」作爲藉口，於一八〇六年向普魯士發動戰爭——因而激化出以（德意志）文化、族民（*volk*）對抗（法國、西方）普世文明的德意志國族主義（cf. Pinson, 1954: ch. III；Kohn, 1968: part I）。在德國，以赫德作爲主要代表的民族浪漫主義、文化民族主義及其「文化 vs.文明」、「感性 vs. 理性」等命題，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即已出現。但要等到十九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德國浪漫主義式的民族理念才「政治化」爲一種與國家相結合

---

[26] 參見 Marx and Engels (1976) 所收之《德意志意識型態》。

[27] 參見柏林（2004：esp. ch. 8）、Berlin (1996; 1999; 2000)。

[28] 參見 Berlin (1999; 2000)、Barnard (2003)、Mah (2003) 論赫德。

[29] 參見 Berlin (1996: ch. 8)、Iggers (1968: ch. II)。另見 Fichte (1922)。

[30] 參見 Iggers (1968)、Meinecke (1972) 論 19 世紀德國歷史主義。

[31] 參見 Woods (1996)、Farrenkopf (2001) 論史賓格勒；Wolin (2004: ch. 2) 論容格；Balakrishnan (2000) 論施密特；Bourdieu (1991)、布迪厄（2009）、Bambach (2003) 論海德格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政治國族主義。費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書》及黑格爾的國家哲學，即是其最著名的思想代表。[32]

費希特等國族主義者對法國之強烈不滿，除了拿破崙攻打普魯士的近因外，當然也是因爲：他們的確覺得德國不如法國。此種「尊嚴受創」、「承認不足」的感受由來已久，故而在拿破崙戰爭的刺激下，進一步凝固爲以法國（和西方）作爲他者，以啓蒙、普世文明作爲抵抗對象的國族主義言說。此前，德國也是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重鎮，而且出了康德這位偉大的啓蒙哲學家。但由於法國廣受推崇爲啓蒙、文明的真正代表，德意志國族主義者遂決意把啓蒙——及政治平等、自由民權、民主共和等訴求——劃成異己。亦即：將其相對化、他者化爲「外於德意志文化與族民」、「外於民族魂」的某種西方污染（Greenfeld, 1992: 352-378）。

一八〇六年以降，這樣一種以法國作爲妒恨對象，反西方、反啓蒙、反民權、反共和的國族主義，在德國取得了龐大的影響力。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德國的自由主義勢力也在上升；新興的德意志國族主義尚能吸納有限的自由主義要素。但即使如此，十九世紀的德國自由主義同樣受到國族主義、國權至上思想的強勢影響。德國所謂的「國族自由主義者」（national liberals）幾乎一致認爲：德國自由主義不應該接受法國那種訴諸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的自由民權觀，而應該爭取較爲溫和、有限的自由與憲政，以免與國權發生衝突。[33]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失敗之後，本已相當有限的自由憲政訴求，變得更加弱勢。著名的德國史家韋勒（Hans-Ulrich Wehler）指出：

> 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對德國的國族主義而言意味著又一次深刻的轉折。因爲這一緣故，……德國的國族主義在一八四八年以後失去了它的自由主義的因素，確切地說，是排除了自由主義的因素，而各種敵視性的因素卻不斷加強，以致最後，各種敵視的

[32] 參見 Fichte (1922)、費希特（2003）。另見 Marx (1975) 所收之〈黑格爾國家學說批判〉。

[33] 參見 Krieger (1957)、Sheehan (1978) 論 19 世紀德國自由主義。所謂「法國那種訴諸自然法或自然權利的自由民權觀」，指的是德國國族自由派的主流見解。至於法國自由主義是否合乎此種定位，顯然仍有爭論空間。另見 Keohane (1980) 論 16 至 18 世紀法國論者的國家思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概念和反對的姿態完全佔據了支配性的地位（2009：89）。

後來在俾斯麥的統治下，國族自由主義者就連本已溫和有限的自由憲政主張，都無法繼續堅持下去（cf. Iggers, 1968: ch. V）。

歷史地看，以「西方式」民權主義作爲主要對立面的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定型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並在俾斯麥時代「完全佔據了支配性的地位」。其主要特徵包括：國族浪漫主義；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國家崇拜；趕超西方以取而代之的強權欲望；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際觀；反民權、反共和、反政治平等、反社會民主；威權主義式的國族社會主義（或共同體主義）；有機的、和諧的國族共同體想像；以德意志文化、族民爲本的文化國族主義；反西方污染；反猶，視猶太人爲某種西方污染；把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歸罪給西方；反西方現代性；聲稱要超克西方現代性；譴責墮落的西方，以解放、復興西方作爲使命，視自己爲真正的西方之子，等等（esp. Greenfeld, 1992: ch. 4）。

國族浪漫主義，是把浪漫主義套用於國族大我、國族真我的一種言說。如柏林所指出，這種主義拒絕承認「外於國族真我」的更高道德或政治原則之存在與約束力。它傾向於否定一切「外在」的理性或普世標準，而直接訴諸國族情感，以國族大我之「自我創發」、「自我決定」作爲其自我正當化的說詞（Berlin, 1996: ch. 8）。在理性主義者看來，這類說詞也許相當貧乏，因其以「我就是我」來逃避一切詰問——但這正是國族浪漫主義的題中之意。[34]

在昔日德國，國族浪漫主義還呈現出強烈的權力欲望。後者顯現在，例如：黑格爾所闡發的「權力國家」（*Machtstaat*）概念——一種不接受任何他律的國家理念。此種「強就是對」的國家理念，及其所蘊含的道德相對主義（道德相對於權力），以及（準）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際觀，深刻影響了好幾代的德意志國族主義者（Pinson, 1954: 50-52；Meinecke, 1984）。深受黑格爾影響的德國史家、黑格爾學家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後來表示：黑格爾把「近代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帶入德意志，

[34] 另見 Löwy and Sayre (2001) 論浪漫主義的各種政治傾向。浪漫主義與國族主義的結合，只是其中的一種可能而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亦有所創新；其將個體與整體、理性與非理性因素皆納入理論架構，意在克服道德與馬基維利主義的分裂。但黑格爾「美化了國家利益至上理念的黑暗面」，而特來區克「一再稱國家本質唯權力時，使得許多在生命鬥爭中渴望獲得簡潔有力的指導原則的人變得狹隘而尊崇赤裸裸的權力，而使國家的問題粗俗化」。[35] 邁涅克是保守派國家主義論者，他對黑格爾和特來區克的以上批評，揭示出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者的國權至上、權力至上理念已相當激進。後來韋伯對德國資產階級缺乏「強權直覺」的質疑，亦與此相關（cf. W. J. Mommsen, 1984）。

儘管德意志國族主義強調其本土文化（相對於普世文明、西方文明）的獨特性，但同時以「權力國家」這類概念作爲中介，指向其支配西方、世界的國族使命（mission）及其普遍性。「使命」之說，原是赫德所提出：每個文化民族都有其獨特性，都應該以其獨特性貢獻於人類，並視此貢獻爲其民族使命（Barnard, 2003）。然而，當這種使命被政治化爲國族使命，並與「權力國家」相結合時，其意義就變得不同。早在一八〇七年費希特的《告德意志民族書》及同時代的「國族使命」言說當中，即可看出強權意志、支配意志之於其國族敘事的關鍵性（Fichte, 1922）。[36] 要言之，德國的「國族使命」或「世界史使命」被界定爲：取代墮落的西方，復興西方，乃至成爲西方的支配者。尚未被德國所支配的西方是墮落的、虛有其表的，德國必須拒絕這種西方性，並堅持自身文化的獨特性和優越性。當德國成爲真正的強權，德意志文化的普遍性將得到實現（Pinson, 1954: 49；Greenfeld, 1992: 364-367, 371-378）。

德意志國族主義的獨特性（乃至普遍性）聲稱還包括：它是一種根植於德國文化、族民，並致力於捍衛、實現其獨特性（乃至普遍性）的國族主義。在德國，先是有了以德意志文化、族民、精神作爲基底的民族觀，然後，才出現結合「民族」與「國家」的國族主義。正因爲前者（民族觀）有其深厚之基礎，德意志國族主義者從一開始就宣稱：國家（應）是文化民族的體現及守護者，（應）是一「族民國家」（*Volkstaat*）。在此，德

[35] 參見邁涅克（2008：xxxiii-xxxiv），引自黃福得的中譯導讀。
[36] 另見費希特（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志國族被想像爲一有機的、和諧的國族共同體；其國家與文化、族民的關係，是有機的、和諧的、非異化的。德意志國家（應）是超克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異化關係的「族民國家」，（應）是一「倫理的全體」（Greenfeld, 1992: 367-371；Pinson, 1954: ch. III, ch. IV）。

若謂國族皆是「想像的共同體」，德意志國族也不例外；但國族共同體的想像方式不只一種（Anderson, 1983；Hobsbawm and Ranger, 1983）。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的特性在於：它希望藉由國家的力量以排斥來自西方的現代性污染，以保持德意志文化、族民的純潔性，以維繫有機的、和諧的國族共同體；但爲了富國強兵，爲了趕超西方強權，它實際上接受了許多現代性要素，包括國族主義、官僚國家、（受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現代科技、工具理性等。

相對來說，十九世紀的烏托邦共同體主義、烏托邦共產主義思潮，包括馬克思的和諧共同體想像，絕大多數是反現代國族主義、反現代國家的。它們反抗來勢洶洶的現代浪潮，渴望建立或重建某種有機的、和諧的共同體。也正因此，它們拒絕了現代國族主義，並把現代國家視作一種異化力量。[37] 表面上，德意志國族主義似乎更有現實感，因其以現代國家作爲其和諧共同體的後盾。但現代國家真能與反現代、或超現代的和諧共同體相適應嗎？早在一八四〇年代，馬克思即對黑格爾提出了這個質疑。在馬克思看來，德意志國家所宣稱體現的「普遍利益」只是假象而已。[38]

二十世紀的原教旨主義政權，多訴諸這種或那種反現代的和諧共同體想像，並以此作爲壟斷國家權力的理由。這類「反現代的現代主義」的悖論在於：以現代國家的力量，或可把異議者打成西方污染，但卻不可能營造出其所宣稱的和諧共同體。可以說，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正是一種「反現代的現代主義」。這種主義希望藉由現代國家的力量，以捍衛德意志共同體作爲理由，清除一系列被認定爲「西方污染」的體內毒素。猶太人，正是必除之而後快的西方污染，因其象徵著來自西方的普世主義、物質主義和自由意識。費希特不是希特勒，但早在一七九三年，他即已把猶

[37] 另見 Walicki (1995)、陳宜中（2009a）論馬克思的和諧共同體想像。

[38] 參見 Marx (1975) 所收之〈黑格爾國家學說批判〉，以及 Marx and Engels (1976) 所收之《德意志意識型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人界定爲某種禍害：「我所能想像到的賦予猶太人市民權的唯一方式，就是在一個夜晚把他們的腦袋通通切掉，換上沒有任何猶太人觀念的新腦袋」。[39]

對德意志國族共同體構成威脅的，當然不只是猶太人而已。在俾斯麥的任內，德意志國族主義作爲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型態，還正當化了其他種種清洗、壓制西方污染的國家行動。國族禍害（或「帝國的敵人」）還包括其他少數民族如波蘭人，還包括天主教政治勢力、民權人士、中間偏左份子、乃至自由工會與社會民主黨。在一八七〇年代的文化鬥爭（*Kulturkampf*）中，天主教勢力被打成「與（西方）羅馬教廷相勾結」的臥底。在社民黨崛起之前，溫和自制的國族自由派仍被當成是主要的西方威脅。後來，隨著工人階級的抬頭，社民黨遂成了西方污染的主要代表，亦即強力鎮壓的主要標的（韋勒，2009：72-83、89、93）。

反西方、反民權、反現代的德意志國族主義，其所欲排除、壓制的「污染」除了猶太人與波蘭人，除了前述等政治力量外，還看似弔詭地包括了德意志國族主義自身的現代性。這是因爲：爲了富國強兵，爲了趕超西方，德意志國家採納了許多現代性要素——而後者並不是沒有「後果」的。及至十九世紀後期，工業資本主義、官僚化、工具理性、技術主義、物質主義、自私自利主義、快樂主義、更複雜的社會分工、特殊利益的再分化、虛無主義等——這些所謂的「現代病」也「感染」了德國社會。於是，有些激進化的國族主義者把過錯又歸給「西方」，說這主要還是西方現代性的錯（Burrow, 2000: ch. 3）。

對於激進化的國族主義者來說，以國家力量壓制自由民權、民主共和及社會民主人士，或趕走波蘭裔猶太人，皆是捍衛德意志文化、族民的正當手段。但另一方面，他們對德意志國家和社會的現代化趨勢仍有不滿。他們懷疑俾斯麥似乎擋不住現代性的入侵，於是把矛頭進一步指向「西方」現代性。例如，以德意志文化、族民的代言人自居的華格納和拉嘉德（Paul de Lagarde），即對西方現代性所造成的傷害多所不滿，並致力尋

[39] 引自 Greenfeld (1992: 383)，筆者自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求救贖之道。[40] 但當然，在想要超克西方現代性，卻懷疑德意志帝國已快被西方現代性超克的論者之中，尼采是更著名、也更有影響力的一位。[41] 受限於篇幅，本文不擬深究這脈更激進的現代性批判思潮（Burrow, 2000: ch. 3）。

對現代性（包括資本主義、官僚國家、工具理性、物質主義……等等）進行批判和反思，毋寧是相當有必要的。但總的來看，作爲一種特殊的論述形構，十九世紀全盛時期的德意志國族主義所蘊含的現代性批判，卻是偏頗的。它把「西方式」民權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視爲最主要的現代性污染，甚至視其爲「帝國的敵人」，並以「反西方」之名鎮壓、清洗之。另一方面，爲了富國強兵，它又極大程度擁抱了國權至上的現代主義。這一特定的現代性批判的效應或後果，簡單地說，就是一種「國權壓倒民權」的反現代的現代主義。

肆、德意志國族主義（II）：思想與現實之間

「德意志獨特道路」一詞出現在十九世紀晚期，原是保守派論者用以形容、稱讚德意志國家（第二帝國）的一種說法。他們認爲：不同於那些疲於因應由下而上的民權訴求的西方國家，德意志國家及其統治精英往往能在民主壓力升高以前即將之壓制、化解或收編，因而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由上而下的、國權至上的富國強兵道路。[42] 正如雅克（Martin Jacques）推崇今日中共的國家能力（2009），他們高度讚揚第二帝國的輝煌表現。

---

[40] 參見 Burrow (2000: 137-138, 213-215) 論拉嘉德，另見 Hollinrake (2010) 論華格納。

[41] 早在 1870 年代，尼采即已把西方現代病的病根，追溯到蘇格拉底（理性主義）和基督教（理解爲一種腐蝕強者的弱者道德）（2000）。有別於華格納、拉嘉德等論者，尼采（後來）對狹隘的德意志文化國族主義、族民沙文主義嗤之以鼻（Hollinrake, 2010）。但尼采與 19 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的思想系譜，至少有一項關聯性，即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抗。尼采所提供的救贖不是納粹主義，而是一種政治反動的、瞧不起弱者的、貴族精神式的、美學式的、訴諸前蘇格拉底的希臘的、酒神戴奧尼索斯式的、查拉圖斯特拉式的超克哲學。從尼采，我們不難窺見反西方、反民權的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所起到的作用，及其所隱含的激進化趨勢。

[42] 參見註 2 關於「德意志獨特道路」的說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後來也有許多更激進的德意志國族主義者（包括拉嘉德、韋伯、乃至一九二〇年代的「保守主義革命」人士），雖接受或不反對「德意志獨特道路」的理念，但認爲第二帝國的表現不佳，德國必須另起爐灶（如民粹主義式的偉大領袖）才能真正走出獨特道路。[43]

可以說，形成於十九世紀初、後來在第二帝國時期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本身即是一種召喚「德意志獨特道路」的言說——因其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的國族浪漫主義早已蘊含著強烈的獨特性聲稱。正因其是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型態，其對「德意志獨特道路」起了相當大的型塑作用——這是其一。不過，在德意志獨特道路的「言說」與「現實政治」之間，卻也不存在簡單的一對一關係——這是其二。以下，我們主要將從這兩個角度，探討國族思想與政治現實的關聯性。

韋勒指出：「德國傳統的國家思想有如一個到處瀰漫的霾罩，籠罩在一八七一年建立起來的德意志帝國的上空」。一八二〇年代以後，黑格爾式的國家理想主義

> 通過普魯士的大學傳播開來。……國家由於上帝的恩賜而成了道德的體現，被賦予了一種具有神性的地位。而這種神性的地位最終變成了庸俗的國家崇拜……有兩個重要的社會集團成了這種國家理想主義的最突出的載體。一個是官僚群體。……另一個是文化資產階級。……這兩大集團共同合作，經常將這種國家理想主義引進精英們的討論之中、公共輿論之中以及教育之中。……這種獨裁的國家思想不僅從一般意義上阻止了德國通向政治現代化的道路，而且直接地有利於德意志帝國的政治統治結構。……德國的這種國家思想，尤其是它的國家機器的超黨派性的神話，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甚至以後，都還保持著巨大的影響力（2009：87-88）。

在俾斯麥時代（一八六二至九〇年），德國當局堅定的反民權主義立場即

[43] 參見 Burrow (2000: 136-146) 論拉嘉德和韋伯。另見 Woods (1996) 論 1920 年代以降的「保守主義革命」思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已展露無遺。所謂的「德意志獨特道路」，在政治上係由俾斯麥及其背後的普魯士寡頭集團所強力維繫。俾斯麥在致力於經濟發展、富國強兵的同時，以頑強但高度靈活的手段，壓制爭取民權和政治改革的「帝國的敵人」。一方面，德意志國族主義者的「獨特道路」言說，爲俾斯麥的統治提供了正當性。另一方面，正因爲俾斯麥看似頗爲成功地抵擋、分化了政治改革的壓力，「獨特道路」言說又彷彿得到了現實的佐證。[44]

俾斯麥所走的「德意志獨特道路」，是一種國權壓倒民權的、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道路。德國作爲後發國，其國族打造係由普魯士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從一八六〇年代到一八七〇年，俾斯麥打了三場勝仗，包括普法戰爭，遂爲德意志第二帝國（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八年）奠定了基礎（cf. Pinson, 1954: ch. VII）。在俾斯麥任內，工業資本主義獲得了長足發展。但政治上，「君主立憲」只有君主是真，立憲至多是半真半假。實際掌握權力的，仍是俾斯麥和他所服務的普魯士寡頭集團。馬克思曾把第二帝國形容爲「以議會形式粉飾門面、混雜著封建殘餘、已經受到資產階級影響、按照官僚制度組織起來、並以警察來保衛的、軍事專制制度的國家」，可謂到位（韋勒，2009：20-21）。[45]

表面上，有不同政黨，有選舉競爭，有帝國議會，但幾乎都被俾斯麥架空。包括帝國議會在內，議會選舉制度幾無起碼的公平性；普魯士的三階級選舉制度及選區劃分，預先決定了保守派議員只需（相對於社民黨議員）十分之一或更少的選票就能當選。爲了維穩，俾斯麥並以出版禁令、新聞壓制、驅逐出境、司法迫害、《反社會主義法》（一八七八至九〇年）及其他安全措施，一路壓制社民黨及民權人士（韋勒，2009：69-72、89）。俾斯麥說：「只要我們無法用國內立法踏滅這個共產主義的蟻堆，我們就不會有復甦」（韋勒，2009：69）。

此前，《反社會主義法》這類特別立法，也針對過天主教徒（cf. Pinson, 1954: ch. IX）。除了這類政治特別法，以及赤裸裸的階級立法，還有通過行政體系、軍隊、司法機構以發揮作用的各種非正式的歧視機制。爲了確

[44] 以下關於俾斯麥統治的部分，主要參考的是韋勒（2009：ch. 3），並對照 Wehler (1985: ch. III)。

[45] 另見 Draper (1977) 論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理解波拿巴主義與俾斯麥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保公務員之忠君愛國，俾斯麥以「改革」之名，推出種種忠誠檢查的手段。這些做法顯現出俾斯麥式維穩的激進性格：它反對的不只是共產主義，不只是平等的公民權利，不只是政治權利；就連「平等的市民權」、「法律之前一律平等」、「不歧視」等底線要求，也很難見容於他的獨特道路（韋勒，2009：56-57、73、81、88）。

在俾斯麥「大棒與胡蘿蔔」的兩手策略下，大資本家逐漸被收編爲「自己人」而與舊的寡頭集團合流。國族自由派和小資產階級則因爲害怕工人階級，而寧願支持（或不反對）俾斯麥式的統治。爲了壓制自由工會和社民黨的發展，俾斯麥主張在動用《反社會主義法》（大棒）的同時，以國家養老金（胡蘿蔔）吸收部分工人的支持：「要在大量的無產者之中製造……保守的意識，而這種保守的意識產生於享受養老金的權利的感覺」（韋勒，2009：116）。換言之，年金保險不是爲了實現更大、更多的公民權利（如基本社會權），而是一種國家統合主義式的、以胡蘿蔔交換忠君愛國的「經濟誘因」。

鐵血宰相俾斯麥在他的任內，頗爲成功地分化、壓制了由下而上的民權主義要求——雖並未、也無法徹底消滅之。極權主義是二十世紀的現象，而在十九世紀後期的西歐，俾斯麥政權的「維穩」表現可謂突出。及至一八九〇年俾斯麥下台時，第二帝國的權力中心——掌握其軍事與官僚機器、收編了大資本的普魯士寡頭集團——仍不動如山。這一突出的維穩表現，進而強化了「德意志獨特道路無堅不摧」的幻覺。如果「大棒與胡蘿蔔」的維穩對策有效，如果國家統合主義式的手段無往不利，那麼，第二帝國又何必向「西方式」民權主義（政治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妥協？這似乎正是保守派論者所謂的「德意志獨特道路」的題中之意。

但現實仍在於：俾斯麥已引進了許多現代性要素，而其社會與政治後果是無從徹底消滅的。俾斯麥任內的維穩成功，不代表這種不公正的維穩是沒有政治成本的——儘管這些成本很難從實證的社會科學或歷史研究加以定量。很快的，俾斯麥一下台，社民黨就在一八九一年通過了艾爾弗特綱領（Erfurt Program）。其改革目標包括：普遍選舉權（含女性投票權）、議會民主、地方自治、比例代表制、言論自由、政治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兩性平等、反種族歧視、同工同酬、政教分離、廢除死刑、義務教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工人的組合權利、縮減工時至八小時、勞動安全、廢止童工、廢除對農民工與幫傭之歧視、週休一日半、漸進的所得稅與財產稅、漸進的遺產稅、工人保險制度、工人參與管理等等。這些訴求顯示：當時社民黨不僅追求社會平等，不僅爲工人階級爭權益，同時也是公民權利、民主自由、兩性平權的先鋒（Sassoon, 1996: ch. 1）。

在社民黨所提出的訴求之中，後來有少部分與工人利益相關者，被「後俾斯麥」的統治當局作爲妥協而接受了。但不斷壯大的社民黨仍是心腹大患，其「帝國的敵人」、「暗通西方的內奸」屬性依然不變（韋勒，2009：117-118）。在德國通往一戰的道路上，究竟有多少決策是爲了壓制社民黨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污染？史學界雖無絕對的定論，但這個面向之存在及其重要性已難否認（cf. Fischer, 1967；1991）。[46] 在此，反西方、反民權的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又再次顯現其威力。或更確切地說，這種國族思想及其對「德意志獨特道路」的迷信，很容易就被俾斯麥及其後繼者所利用。

就德意志第二帝國來說，一八九〇年是一重要的分水嶺。在一八九〇年俾斯麥下台以後，要求政治改革與社經改革的壓力日增，社民黨的支持基礎不斷擴大。與此同時，寡頭權力集團進一步向軍國主義傾斜，想要以戰爭動員來壓制民權要求，從而鞏固其統治地位。韋勒稱其爲「向前逃跑」的統治策略，即藉由戰爭準備、軍國主義的社會化、乃至戰爭本身來解決內部敵人（2009：171-191）。[47] 一戰失敗導致了一九一八年的革命，第二帝國隨之瓦解（cf. Mommsen, 1996: ch.1, ch. 2）。然而，忽然掌握權力的社民黨主流派決定向軍方和寡頭權力集團妥協，以避免發生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一九二一年誕生的威瑪共和，即是此種妥協下的產物（H. Mommsen, 1996: ch. 2, ch. 3）。在民主共和的形式下，頑強的舊權力集團及其國族主義思想，很快又恢復了生機。傾向於專制復辟的「保守主義革命」人士，未必都支持希特勒的版本；但最後是希特勒掌握了歷史機會，把德意志國族主義帶往最恐怖嚇人的極端。[48]

現代統治者對於國族情緒，一般總是抱持著機會主義的心態：可利用

[46] 另見 Evans (1989) 的相關評論。
[47] 另見 Fischer (1967; 1991) 的著名分析。
[48] 關於威瑪共和史，本文主要參考的是 H. Mommsen (1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則利用，但避免騎虎難下、引火自焚。黑格爾式的神格化國家、倫理國家、族民國家，如馬克思所指出，從來就不是現實而只是假象。現實地看，寡頭集團鞏固其權位於不衰的特殊利益動機，與知識份子崇高的國族主義言說，並非同一回事。利用後者以兌現政治利益，幾乎是現代統治者的本能。但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之被利用顯非偶然，因其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浪漫主義化的國族思維有如一張「空白支票」，讓統治者或野心家有相當大的透支自由——即使破產也還把責任都推給「西方」，推給「帝國的敵人」。

在某些情況下，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的政治性格是保守的——一路爲「德意志獨特道路」乃至後來的軍國主義政策背書。但在不同的現實條件下（如威瑪共和），它也可以搖身一變，改與顛覆政治現狀的革命勢力（如「保守主義革命」運動）相結合。早在俾斯麥時代，已有論者認爲他對內或對外的表現差強人意：對內，未能有效過濾西方現代性的污染；對外，則未能充分實現德意志的帝國使命。彼時這些論者還在少數，其對「德意志獨特道路」的不滿，只是潛流。但在一九一八年第二帝國瓦解後，新一波更激烈的、把德國問題進一步歸罪給西方的、充滿危急存亡意識的極端國族主義思想，遂開始發作，並與同步崛起的歐洲反民主、反民權思潮相激盪。就其效果而言，這爲納粹掃除了障礙，使納粹興起成爲可能。[49] 套用赫緒曼（Albert O. Hirschman）的話來說，德意志國族主義思想的激進化，「促成歷史上最震撼、最具毀滅性的自我實現預言」（2002：23）。

一戰後的韋伯，寄希望於民粹主義式的超凡政治領袖，以帶領德國實現其強權使命、帝國使命——這儼然成了他超克現代的最後希望所在（W. J. Mommsen, 1984）。一戰後暴得大名的史賓格勒，更明確地把超克現代、超克（即將沒落的）西方，視爲普魯士國族社會主義的使命（1920）。[50] 海德格爾把德意志族民主義理論化爲一種存有哲學，呼應尼采去尋找希臘資源（理解爲未受近代西方人文主義污染的傳統），最終在納粹那裡找到了依靠。[51] 施密特對威瑪共和的批判，治者與被治者的同一性理論，非敵即

[49] 參見 Woods (1996) 論威瑪時代的「保守主義革命」思潮與運動。
[50] 另見 Woods (1996)、Farrenkopf (2001) 論史賓格勒。
[51] 參見 Bourdieu (1991)、布迪厄（2009）、Bambach (2003) 論海德格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友的政治性概念等，或許稱得上是對德意志國族主義的基本命題的再激進化（cf. Balakrishnan, 2000）。這些著名論者皆不是庸俗的納粹主義者（雖然海德格爾和施密特投靠納粹），但其這種或那種激進化的德意志國族主義（或「保守主義革命」）言說，仍多少起到了「替納粹掃除障礙」的作用。

在戰後初期，部分保守派的德國史家，曾致力爲德意志國族主義傳統提供辯護。照其說法，納粹主義或源出偶然因素，或是國際潮流下的產物（即「法西斯主義是國際現象」），或是西方現代性與民主制的惡果，或其實是德國人民奮力抵抗的對象；故而，納粹主義跟十九世紀以降的德意志國族主義傳統，幾乎非親非故。他們認爲，納粹主義的根源要到現代「西方」文明去尋找，而不是到德意志國族主義傳統當中去尋找。[52] 在此，我們又見識到了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的巨大作用力：千錯萬錯主要都是「西方」、「西方文明」、「西方現代性」的錯，而納粹主義正是「西方污染」下的產物。所幸，一九五〇、六〇年代以降，這種說法已不再爲人輕易接受。

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當然不等於二十世紀納粹主義，但前者爲後者提供了重要的歷史鋪墊。誠然，任何主義都可能遭到濫用；所有極端化的國族主義都帶有法西斯傾向，都可能幹出恐怖嚇人的行徑。但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作爲一種國族主義範式，其問題不僅如此而已。其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浪漫主義化的國族思維，先是使得許多人沉醉在「德意志獨特道路無堅不摧」的幻覺之中，因而斷送了漸進的民權改革的契機。此後，更因其把「反西方」和「反民權」不斷上綱，把至高無上的國權思想、國族使命更絕對化，而終至「助使」納粹興起成爲可能。

[52] 參見梅尼克（F. Meinecke）（1991）的保守派說法。另見 Iggers (1968) 以及 Evans (1989) 的相關評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反思與商榷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留下了一個名句：「黑格爾曾在某處說過，所有偉大的世界史事件和人物都會出現兩次。他忘了加上：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Marx and Engels, 1969: 398）。[53] 據赫緒曼的觀察：「第二個事件之所以有『鬧劇的』性質，正因爲它是模仿、衍生、尾隨第一個事件而來的。這樣的規律性在觀念史中遇到的機會，可能比在事件史裡面更多」（2002：182）。從這個角度來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作爲觀念）被模仿、尾隨的機會，要比「德意志獨特道路」（作爲事件）被模仿、尾隨的機會來得多。而事實上，反西方、反民權的德意志國族主義（作爲觀念）的確是不少後發國知識份子的模仿對象——無論自覺與否。一九二〇、三〇年代以降的日本即是顯例。[54]

時下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及其爲「中國獨特道路」所提供的辯護，既不是那麼中國特殊，也不是真的全盤反西方。相當程度上，它是對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西方現代國族主義的重要範式之一）的第 n 次模仿。其歌頌「中國獨特道路」、「黨的政策亞克西」的話語，彷彿是昔日「德意志獨特道路」話語的第 n 次回聲。它複製了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的主要特徵如：反對「西方式」民權主義，以「反西方」之名拒絕民權主義；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國權崇拜；趕超西方的強權欲望；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國際觀；國族浪漫主義；有機的、和諧的國族共同體想像；國族社會主義式的社會主義宣稱；反西方精神污染；把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歸罪給西方（而非本土的寡頭權力集團）；聲稱要超克西方現代性，等等。

在政治現實面上，今日中國與德意志第二帝國確有不少差異，但「中國獨特道路」與「德意志獨特道路」仍有顯著的家族親近性在於：爲了富

---

[53] 此段文字爲筆者自譯。

[54] 關於日本 1920、30 年代以降反西方的國族主義、國家主義思想，另見 Najita and Harootunian (1988)、Harootunian (2000)、丸山眞男（1984）、Maruyama (1963)、鶴見俊輔（2008）、子安宣邦（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強兵，爲了趕超西方，兩者皆以國族主義、國家主義作爲統治利器；但對於隨著資本主義發展而增強的民權主義訴求，卻始終抱持著強烈的敵對態度，視之爲妨礙其大國崛起的西方污染。

就思想與現實的關聯性而言，正如同第二帝國的保守派人士爲「德意志獨特道路」感到驕傲，反民權的中國國族主義者也爲黨國領導的「中國獨特道路」叫好。在第二帝國時代，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的國族主義思想，助長了內政的集權化、國權的不斷上綱，因而阻礙、斷送了漸進的民權主義改革。就其實際效果來說（姑且不論其意圖），時下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及其「中國獨特道路」話語，也正在助長中共黨國體制的再集權化，及其對「西方式」民權主義訴求（包括所謂的「維權」人士及活動）的嚴打、清洗。由於「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話語爲黨國提供了重要的意識型態服務，它得到官方的一定支持。而在中國的思想界與知識界，這種言說也已漸具影響力。

昔日德國經驗的重要啓示還包括：當「獨特道路」出現危機時，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者不但不會自我反省，反而更趨激進化，更原教旨主義化，遂使更極端的法西斯主義成爲可能。在毛澤東時代，極端的國族社會主義已經實驗過了一次。如今，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若說它會捲土重來，多少顯得危言聳聽。但若以德國作爲參照，則至少不能排除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在危機時刻轉趨政治激進，轉而支持「領袖與群眾專政相結合」的可能。[55] 由於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浪漫主義化的國族思維，傾向於把一切過錯都歸給「西方」、「西方同路人」、「西方現代性」；一旦發生危機，它不但並未排除更極端的法西斯主義形式，甚至將替後者掃除障礙。在一九二〇年代的德國，激進化的「保守主義革命」思想和運動，即起到了顛覆威瑪共和的作用。[56]

把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歸罪給「西方」的傾向，在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以降中國新左派的「反西方新自由主義」言說中也可以看到。

---

[55] 晚近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暗示某種「領袖與群眾專政相結合」的激進化道路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另見「烏有之鄉」網站的毛左派言說。

[56] 參見 H. Mommsen (1996)。另見 Woods (1996)、Bourdieu (1991) 論「保守主義革命」思想和運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彼時，新左派論者多認爲「新自由主義」是造成種種社會不公的元兇。[57] 但如今，這些論者大多擁戴「中國獨特道路」，也不再譴責中共（胡溫）倒向新自由主義（汪暉，2010；cf. 2000）。有些批評者遂質疑新左派：爲何過去批判新自由主義，現在卻不批判？[58] 畢竟，「新自由主義」一詞所指涉的現象，包括爲了經濟成長而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爲了 GDP 指數而製造、加深種種社會不公正——這些基本面在今日中國依然俱在。新左派若僅因胡溫體制下有限的民生改善，就拒絕對中共從未真正改變的發展總路線進行批判，又怎能自圓其說？這些批評不無道理，但可能相對低估了貫穿新左派論述的國族主義主軸。新左派昔日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乃至今日對西方式民權主義的批判，主要是從中國式「國族社會主義」的角度在排拒「西方污染」。此與多數西方左派對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批判——即從平等主義、民權主義的角度反對社會傾銷，並要求更大、更多的公民權利的實現——並非同一回事。[59] 「此左」（國族社會主義）本非「彼左」（民主社會主義），這或許不該讓人意外（cf. 陳宜中，2009a）。

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及其背後的感覺結構，即使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的今日中國，仍是一股不容低估的力量。這股力量來回擺盪於保守和激進之間，其保守派或右翼代表（如新左派）如今爲「中國獨特道路」叫好，但其更激進的、更徹底否定改革開放的毛派潛流也一直存在。在危機時刻，如若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者一面倒向更極端的法西斯勢力，那會是完全的意外嗎？在中國，也許找不到德意志「族民」主義的同等物，但毛式的領袖與群眾專政，及其國家與民族、人民的同一性想像，可能仍有其可觀的爆發力。把過錯都歸給「西方」、「西方同路人」的國族民粹主義、國族沙文主義，在中國顯然還是活火山，而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者正在替它添加燃料。

---

[57] 關於 1990 年代後期以降的新左派言說，參見許紀霖、羅崗等（2007：362-398）所收錄之代表性文章目錄；羅崗、倪文尖編（2000）第二、三卷；李世濤編（2000）第三冊。另見高力克（2007）的評析。

[58] 劉擎（2009：18-19）、朱元鴻（2010）皆提出這一質疑。

[59] 參見 Bourdieu (1998) 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但當然，所謂的「西方左派」也有分歧，很難一概而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以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作爲參照，其目的不在於預言中國未來，而主要在於指出：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當下」就正在把中國推往不可欲的方向。中共以其市場斯大林主義體制推動經濟成長，此種激進的「低人權發展道路」既取得可觀的經濟成就，但也在同一過程中製造、加深了種種社會危機。表面上，胡溫更重視民生，但民生改善是有限的；其以「GDP 指數」和「維穩」作爲兩大主軸的發展總路線，依然不變。正因爲這種「中國獨特道路」產生了種種問題，正因爲不受監督制約的官僚權貴資本主義有其種種惡果，因此，由下而上的民權要求與政治改革壓力與日俱增。在此情況下，中共不改其路徑依賴，選擇動用更嚴厲、更不公正的維穩手段，同時釋出有限的胡蘿蔔（民生實惠）以鞏固政權——這是俾斯麥式的國家統合主義、大棒與胡蘿蔔策略。但正如第二帝國的後來發展所暗示：這種政治反動的代價很大，可能預支、透支了中國和平繁榮的政治未來（cf. 陳宜中，2010b）。「德意志獨特道路」的執行者和歡呼者，曾以爲他們真已排除了和平演變——但卻迎來了一九一八年的革命（Mommsen, 1996: ch. 1, ch. 2）。很不幸的，在時下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當中，看不見任何與此相關的反省和自覺。

進而言之，這類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浪漫化的國族主義言說，已是世界史上的第 n 次，而不是第二次。但其言說者卻彷彿矇住了自己的眼睛，不斷宣稱中國有多中國特殊。正因其（自覺或不自覺地）模仿西方國族主義的德意志範式，且大量挪用西方反啓蒙、反民權、反民主的反動派言說，其自身的「西方性」實昭然若揭。但另一方面，它卻把民權主義打成西方污染——彷彿近代西方無人反民權、無人支持奴隸制、無人爲專制主義辯護。

然而，近代西方的統治階級及其知識代言人，真不反對民權主義嗎？儘管德國以「反西方」之名，走上了一條更極端的國權壓倒民權的道路；但在十九世紀西歐，是被宰割的工人階級力爭普遍選舉權，而大多數精英是反對普遍選舉權的。[60] 在美國，黑奴問題要靠南北戰爭來解決，黑人民權遲至一九六〇年代仍相當可悲。我們真能說：只有民權主義是西方的，

[60] 參見 Stedman Jones (1983)、Thompson (1963) 論 19 世紀英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要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奴隸制與所有反民權的言說都不是西方的嗎？反民權的中國國族主義者，儼然是要把「霸道的西方」、「反民權的西方」視爲模範，並把「爭民權的西方（受壓迫者）」當成必除之而後快的異己。但這算是「反西方」嗎？

時下有愈來愈多的西方論者，或者出於對自家帝國主義的反感，或者出於對「多元文化」的尊重，或者出於對自身文化的驕傲等各種因素，很願意把「爭民權的西方」給相對化——即把自由民主人權相對化爲「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的產物。[61] 這些論者彷彿是在說：你們要搞東方專制，我們西方人可以理解（除非你們搞種族滅絕），因爲你們的文化傳承已大體決定了你們的政治；而我們西方人的文化傳承也大體決定了我們不搞專制，而更尊重自由民主人權。可以說，這些西方論者是美化了西方，同時羞辱了中國。西方人搞過奴隸制、種族滅絕，壓迫過童工，大搞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侵略，這些無疑同樣是「西方文化」（如果這說法有任何意義的話）的產物，但卻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了。[62] 當西方弱勢者在爭取民權的時候，幾乎不曾聽說「自由民主人權是西方文化的體現」這類話語。如唐恩（John Dunn）（2005）所指出，今日西方統治階級之所以老把「民主」掛在嘴邊，是因爲這本是弱勢人民的話語，是因爲統治階級挪用人民話語（如小布希政府以政體改造、落實自由民主之名侵略伊拉克），而不是因爲這些是西方文化的什麼真實體現。[63]

不少歷史意識薄弱的、或帶有族群中心主義偏見的西方論者，美化了西方而不自知，還同時語帶善意地詛咒了中國——彷彿專制主義內在於中國最深層的文化基因。殊不知，專制主義是西方歷史上的常態，直到二次戰後才有了較顯著的改變。當中國國族主義者把西方式民權主義打成異己時，無異於接受了西方論者「多元文化主義式的羞辱」：你們祖宗就是如此，你們今天這樣也毫不意外。當前中國反西方、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

---

[61] 持這類說法的西方論者很多，包括 Rorty (1989; 1999)、Gray (2000)、Huntington (1996) 等，族繁不及備載。另見 Sen (1997; 1999; 2006)、Eagleton (2000)、Benhabib (2002) 對這類說法的批評。

[62] 另見陳宜中（2007）對這類道德相對主義言說的分析和批評。

[63] 另見 Dunn ed. (1993) 論民主的歷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但把中國給「自我東方專制主義化」，還甚至以此爲榮：我們中國就是這樣，祖宗如此，未來也是如此。於是，某種「不受民權主義制約的西方式國族主義、西方式國權至上思想」（一種源起於近代西方的霸道及霸道話語）竟被奉爲中國的正宗，儼然成了中國性與中國主體性的化身。其受「霸道的西方」殖民的程度，又剛好與其對「爭民權的西方」的批判程度成正比。

不受制約的國權主張，興起於近代早期的西方。它起初是關於絕對王權或絕對國家的一套說法：對內，主權者擁有不受限制的絕對權力，其他主權國不得干預其內政（cf. Meinecke, 1984）。[64] 國族主義的歷史起源則較難判定，但其政治力量約自十八世紀中葉起，才變得更清楚可見。現代國族主義，無論是法式的還是德式的，無疑是一種社會動員的利器。「國族」也者，若是抽掉了「族」而只剩下「國」，那肯定是嚴重去勢。正因爲國族主義具有調動情感、汲取忠誠、索取犧牲的巨大能量，與之結合後的「現代國族國家」可謂如虎添翼。[65] 對於曾經受到西方強權欺侮的後發國來說，若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爭平等、要富國強兵、要趕超西方，便似乎非得吞下「現代國族主義」、「現代國族國家」這帖源自西方的猛藥不可。德國、俄羅斯、日本、中國、印度乃至其他後發國，鮮有例外。

十九世紀中葉以降，國族主義與工業資本主義的結合，更進一步助長了西方勢力（包括號稱反西方的德國）在海外的帝國主義掠奪行徑。此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弱肉強食，馬派論者認爲必須從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加以解釋。但顯然，此種西方霸道也與「國族利益」、「國族命脈」、「國族權力」的無限上綱脫離不了關係。[66] 正因爲國族主義帶有龐大的情感動員力與爆發力，這種主義潛在的霸道性格有兩個方面：對外發動侵略、殖民、壓迫弱小；對內整肅異己、壓制民權。在過去兩百年間，這種主義伴隨著西方勢力的侵略、殖民與壓迫行徑而普及於世。相對於人權、法治、憲政、自由、民主等廣義的民權主義要求，「西方式國族主義」毋寧是更強勢、更具普世性（此指接受程度）的一種「西方現代性」。

---

[64] 另見邁涅克（2008）。

[65] 參見 Kohn (1967; 1968)、Hobsbawm (1990)、Anderson (1983) 論現代國族主義。

[66] 另見 Hobsbawm (1987) 論 1875～1914 年的帝國主義年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受制約的國權與國族主義，當然不是西方現代性的全部。從某個角度來看，廣義的民權主義學說（其內部亦有諸多緊張和衝突）在近代西方之興起與發展，其所要「制約」的正是至高無上的國權與國家理由，及其與國族主義結合後如虎添翼的宰制力道，乃至國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結合後所加深的種種暴力與壓迫。喜愛悖論式用語的人，未嘗不可把廣義的民權主義（或公民權利論說）也形容爲一種「反現代的現代主義」。這種主義並非萬靈丹，因其對國族主義、國家權力與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約束作用，及其伸張公民基本權利、政治正義與社會公正的力道，至今仍相對有限——相對於更高的民權、正義和解放要求，相對於更高的政治道德標準。但它的迫切性在於：在民權主義特別衰弱的國家或地區，在國權、國族、資本這些「西方現代性」力量因「諸法皆空」而「自由自在」之處，遭其宰制、壓迫、掠奪的弱勢人民往往得不到起碼的人性尊嚴、起碼的社會公正、起碼的基本權利。就此而言，民權主義只是一種底線要求。

歸根究底，當前中國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浪漫主義化的國族言說，實有其一面倒向國權、國族的「原始西方性」。早在法國大革命爆發以前，反啓蒙、反民權、反平等、反民主的話語就已經在西方浮上檯面。在法國大革命之後，及至今天，這些西方話語從不曾消失。[67] 時下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話語，其具體的反民權說詞也大多來自西方的反動派論者。然而，這真是反西方嗎？反哪種西方？堅決反對「爭民權的西方」，卻甘心情願地被「霸道的西方」、「反民權的西方」束縛、殖民，這種「反西方」話語能自圓其說嗎？

「第二次是鬧劇」——馬克思的名言或仍值得深思。

---

[67] 關於這些西方話語的研究，近年來也已汗牛充棟，此處不擬詳細說明。但參見 Berlin (2000)、McMahon (2001)、Garrard (2006)、Wolin (2004)、Burrow (2000)、Holmes (1993)、Woods (1996)、Levin (1992)、赫緒曼（2002）、Hirschman (1991)、貢巴尼翁（2009）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陸、結　論

> ……德國民族主義，乃是以文化社群爲基礎，塑造強烈的民族情緒來構成政治認同，並意圖「超英趕美」。但歷史已經證明，此種民族主義思維，反映的是弱國對於群體存亡絕續永恆的深刻恐懼，並導致各民族對於其他民族產生了排他性之根本敵意。……此種思維之目的是民族主體的形塑；但由於過度強化自身的存在焦慮以及對外的不信任感，極易演變爲集體的妒恨（resentment），卻無力創造繁榮和平的社會與國家（蕭高彥，2006：227）。

過去，在曾經遭到西方勢力壓迫、凌虐的地區，國族主義者爲了擺脫羞辱、追求承認，大都築起了「體用」論式的心防。他們安慰自己：爲了富國強兵而接受的現代性要素（如國族主義、現代國家、工業化、資本主義）是「用」，但某種本真的、與傳統相繫的「體」仍屹立不搖，或「應該」屹立不搖。於是，他們經常陷入思維怪圈而不自知。他們高舉「反西方」的大旗，但對近代西方最強勢、最具「普世性」（此指世人接受程度）的輸出品——國族沙文主義、國權至上主義——卻愛不釋手，甚至以爲這是自己所固有的。

對此，同情的（自我）理解是有必要的，因爲被西方強權迫害後所產生的複雜情結，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解消。然而，在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中國，這類國族主義情緒和思維，卻幾乎肯定不利於良性發展。柏林說：

> 有人可能希望逕將民族主義打成非理性、使人爲其所奴役的力量……不過，我以爲了解其根更重要。民族主義通常源生於人性尊嚴受創或受辱，欲求出一頭地。這欲望當然是推動人類歷史的最大力量之一。它可能有其可怕的形式，但作爲一種感受，本身並非不自然，亦不可憎。……小國要求獲得承認爲自具過去、現今、未來的主權實體，奮求與大國平等，主張自己有權生存、成長、自由、發言。貧民希望富人承認其爲十足的人類、獲得平等對待，猶太人要基督徒承認，皮膚偏暗者要白皮膚者承認，女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要男人承認，弱者要強者承認（2004：330）。

柏林係從承認政治、妒恨政治的角度，去理解「尊嚴受創或受辱」的小國或弱國的沙文主義。但中國從來就不是小國，而是歷史源遠流長的大型文明載體。或許也正因此，其「要求獲得承認爲自具過去、現今、未來的主權實體」的感受，及其「欲求一出頭地」的渴望，都只會更強。中國早已是獨立國家，但「現代化」的壓力最初是船堅砲利的西方所強加的，而「現代性」的主導元素又幾乎皆源自西方——這包括中共的黨國體制、當前中國的國族沙文主義與國權至上主義。由此所產生的屈辱感，以及擔心「做不成自己」的焦慮，至今仍像幽靈一樣糾纏著部分中國知識份子的頭腦。這種焦慮會被型塑爲某種「我就是我」的反西方的國族浪漫主義，也許並無意外之有。但若以中國的進步未來作爲著眼點，則這種反西方、反民權的狹隘國族主義，很可能只會是中國的負數而非正數。

國家早就獨立了，甚至經濟崛起了；但這種或那種「現代性」分明已在我的體內，我既無法殲滅它，卻又出於自尊而想要殲滅它。關於這種心理狀態，柏林表示：

> 外來文化可能已經深深印在我的文化上……我既已瞥見，就忘不了它們；我出於自尊或獨立之求，而試圖從我體內滌除對它們的所有記憶，則代價極高，自己受害，因爲能做成此事的僅有辦法是大舉窄化自己，強迫自己披上過時的甲冑，刻意重新施行狹隘的標準，必有的危險則是不寬容、抑制成長、心懷侵略性的仇外症、刻意壓制我昨日還知道的眞理——這些，都是論者對沙文主義與孤立主義的正當指責（2004：338）。

如柏林所暗示，國族沙文主義的問題不在於「承認不足，要求承認」的人性尊嚴需求，而在於其追求承認的方式出了問題。在現代社會，要求獲得承認、得到平等對待的人性尊嚴需要，有個人或集體的、多元的、變幻莫測的不同形式。所謂的民權主義或公民權利主張，未嘗不可理解爲種種反羞辱、爭尊嚴的平等化要求。「國族尊嚴」不是不重要，但當其被不斷上綱、被用來壓制其他合理的尊嚴要求時，就幾乎必然導致柏林所指出的「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的危險」。

十九世紀的德意志國族主義言說，及其所正當化的「德意志獨特道路」，或許正可以作爲今日中國的前車之鑑。本文以十九世紀德意志國族主義作爲參照，嘗試從一個更具縱深的思想、政治和歷史視野，回過頭來反思當前中國「反民權的國族主義」言說及其潛在問題。本文論證指出：無論是昔日德意志的原版，還是今日中國的再版，此類反西方、反民權、國權至上、自我浪漫化的國族主義論說皆值得商榷。其危險在於：助長內政的集權化、國權的不斷上綱，阻礙漸進的民權主義改革，進而在危機時刻失控，爲之付出沉重的代價。此外，其以「霸道的西方」（不受制約的國權與國族主義）壓制「爭民權的西方」的言說傾向，也很難自圓其說。

歷史地看，民權主義在百年以來中國國族主義的言說當中，實早已具有一席之地。在現代中國，追求民主共和、民權主義、憲政民主的呼聲最高的時期，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後，而是在中共建政前的那幾年。彼時中共對蔣政權最強而有力的批評，就是譴責蔣介石反民主、反民權（cf. 笑蜀編，1999）。這並不是說中國就應該「照搬」、「移植」或「複製」西方式自由民主。（同理，中國也不該廉價地「照搬」、「移植」或「複製」昔日的德意志國族主義。）然而，現在就急著想把民權主義給清洗掉，又是否言之過早？難道，中國的歷史就已經終結在中共的黨國體制？這真是在爲中國的未來打算？或者只不過是極其狹隘的「朝代」意識？

殷鑑不遠——是爲結論。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丸山真男著，林明德譯，1984，《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兼論日本軍國主義》，台北：聯經。譯自《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都：未來社，1964。

于建嵘，2009，〈當前中國能避免社會大動蕩嗎？〉，搜狐博客網頁，http://yu-jianrong. blog.sohu.com/115839563.html，2010/4/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子安宣邦著，趙京華編／譯，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王紹光，2007，《安邦之道》，北京：三聯書店。

王紹光，2008，《民主四講》，北京：三聯書店。

王紹光，2009，〈論中國政府的學習機制與適應能力——關於中國模式的思考〉，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2/70485.html，2010/4/18。

王超華，2010，〈歷史終結在中國：近十年中國大陸官方意識型態變化解析〉，《思想》，14: 207-231。

王超華編，2004，《歧路中國》，台北：聯經。

布迪厄著，朱國華譯，2009，《海德格爾的政治存在論》，上海：學林出版社。譯自 P. Bourdieu. *L'Ontolog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 Paris: Minuit. 1988。

江　迅，2008，〈改革開放三十年・普世價值・零八憲章〉，《亞洲週刊》，22(51): 26-33。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2005，《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書店。

托特曼著，王毅譯，2008，《日本史》（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譯自 C. Totman. *A History of Japan*. Malden, Mass.: Blackwell. 2005。

牟宗三，1983，《中國文化的省察——牟宗三演講錄》，台北：聯經。

朱元鴻，2010，〈如果美式自由民主不該是中國未來的夢想〉，《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3: 1-46。

朱學勤，2009，〈「同一個地球，同一個夢想」：2008 年中國大陸社會思潮報告〉，《思想》，12: 19-37。

余英時，2000，〈中國近代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李世濤（編），《知識份子立場》，第 1 冊，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頁 1-29。

宋曉軍、王小東、黃紀蘇、宋強、劉仰，2009，《中國不高興》，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汪　暉，2000，〈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台灣社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季刊》，37: 1-43。

汪　暉，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聯書店。

汪　暉，2009a，《別求新聲：汪暉訪談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汪　暉，2009b，〈自主與開放的辯證法——關於 60 年來的中國經驗〉，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09/106225.html，2010/ 4/18。

汪　暉，2010，〈中國崛起的經驗及其面臨的挑戰〉，《文化縱橫》，http://www.sunyefang.org/docs/wenhuazongheng/linger/21224.aspx ，2010/4/18。

李世濤編，2000，《知識份子立場》，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

李曉蓉、張祖樺編，2009，《零八憲章》，香港：開放出版社。

柏　林著，彭淮棟譯，2004，《現實意識》，台北：臉譜。譯自 I. Berlin. *The Sense of Reality*. ed. H. Hard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6。

林毓生，2010，〈嚴正呼籲中共當局釋放劉曉波先生〉，《文化研究月報》網頁，101，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ShowForum.asp?Period=101&F_ID=14，2010/4/18。

殷海光，2009，《中國文化的展望》，台北：臺大出版中心。

韋　勒著，邢來順譯，2009，《德意志帝國》，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譯自 H.-U. Wehler. *Das deutsche Kaiserreich, 1871-1918*.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3。

貢巴尼翁著，郭宏安譯，2009，《反現代派》，北京：三聯書店。譯自 A. Compagnon. *Les antimodernes: de Joseph de Maistre à Roland Barthes*. Paris: Gallimard. 2005。

笑　蜀編，1999，《歷史的先聲》，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

高力克，2007，〈如何認識轉型中國——關於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許紀霖、羅崗（著），《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頁 194-2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　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

梅尼克著，何兆武譯，1991，《德國的浩劫》，北京：三聯書店。譯自 F. Meinecke. *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Betrachtungen und Erinnerungen*. Wiesbaden: Brockhaus Verlag. 1946。

張旭東，2005，《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認同：西方普遍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張旭東，2010，〈中國價值的世界歷史使命〉，《文化縱橫》網頁，2010(1)， http://www.sunyefang.org/docs/wenhuazongheng/lingyiyi/21050. aspx，2010/4/18。

許紀霖，2010，〈普世文明，還是中國價值？近十年中國的歷史主義思潮〉，《開放時代》，215: 65-82。

許紀霖、羅崗等，2007，《啓蒙的自我瓦解：1990 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界重大論爭研究》，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陳宜中，2007，〈道德相對主義及「文化」之濫用〉，蔡英文（編），《現代性之政治反思》，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頁 359-397。

陳宜中，2009a，〈左派有理由支持自由民主嗎？關於中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1: 73-126。

陳宜中，2009b，〈拒絕遺忘：錢理群先生訪談錄〉，《思想》，12: 135-177。

陳宜中，2010a，〈爲自由而限權，爲福利而問責：秦暉先生訪談錄〉，《思想》，14: 163-203。

陳宜中，2010b，〈保守與激進之間：中國政治自由主義的希望與困境〉，《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即將出版。

黃　平、崔之元編，2006，《中國與全球化：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費希特著，梁志學、沈真、李理譯，2003，《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譯自 J. G. Ficht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Hamburg: Meiner. 19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賀照田，2007，〈當代史研究與當前中國的思想與政治〉，《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1: 287-313。

赫緒曼著，吳介民譯，2002，《反動的修辭》，台北：新新聞文化。譯自 A. O. Hirschman.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1991。

劉　擎，2009，〈中國崛起與文化自主〉，《思想》，13: 15-32。

樂　山編，2004，《潛流：對狹隘民族主義的批判與反思》，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潘　維，2008，〈敢與西方展開政治觀念競爭〉，《環球時報》，1/25。

潘　維，2009，〈中國模式：中華體制的經濟、政治、社會解析〉，烏有之鄉網站，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8/200910/109672.html，2010/ 4/18。

潘　維編，2009，《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 60 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摩　羅，2010，《中國站起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錢永祥等，2010，〈「從劉曉波的耶誕禮物——反思兩岸三地的政治未來」座談會發言紀錄〉，《文化研究月報》網頁，101，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ShowForum.asp?Period=101&F_ID=14，2010/4/18。

錢理群，2009，《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 1999-2008》，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錢理群，2010，〈2009 年總結〉，尚未出版。

邁涅克著，黃福得譯注，2008，《德意志的復興時代》，台北：聯經。譯自 F. Meinecke. *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 1795-1815*. Bielefeld: Velhagen & Klasing. 1906。

蕭高彥，2006，〈「文化政治」的魅力與貧困〉，《思想》，3: 205-235。

鶴見俊輔著，邱振瑞譯，2008，《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 1931-1945》，台北：行人。譯自《戰時期日本の精神史：一九三一－一九四五年》，東京都：岩波書店，1991。

羅　崗、倪文尖編，2000，《90 年代思想文選》，廣西：廣西人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版社。

二、英文部分

Anderson, B.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Verso.

Anderson, P. 2010. “Sinomania.”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2 (2): 3-6.

Balakrishnan, G. 2000. *The Enemy: An Intellectual Portrait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Bambach, C. 2003. *Heidegger’s Roots: Nietzsche,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reek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Barnard, F. M. 2003. *Herder on Nationality, Humanity, and History.*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Benhabib, S. 2002. *The Claims of Cultur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lin, I. 1996. *The Sense of Reality.* ed. H. Hard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Berlin, I. 1999.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 ed. H. Hard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lin, I. 2000. *Three Critics of the Enlightenment: Vico, Hamann, Herder.* ed. H. Hard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lackbourn, D. and G. Eley. 1984. *The Peculiarities of Germ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ut, J. M. 1993. *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Bourdieu, P. 1991.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Martin Heidegger.* Trans. P. Coll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Trans. R. Nice. New York: New Press.

Burrow, J. W. 2000. *The Crisis of Reason: European Thought, 1848-1914.*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Buse, D. K. and J. C. Doerr. eds. 1998. *Modern Germany: 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ncyclopedia of History, People, and Culture, 1871-1990. Vol. 2.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Draper, H. 1977. *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 I: State and Bureaucrac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Dunn, J. 2005. *Setting the People Free: The 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Atlantic Books.

Dunn, J. ed. 1993. *Democracy: The Unfinished Journ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agleton, T. 2000.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Evans, R. J. 1989. *In Hitler's Shadow: West German Historians and the Attempt to Escape from the Nazi Pa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Farrenkopf, J. 2001. *Prophet of Decline: Spengler on World History and Politics.*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Fichte, J. G. 1922. *Addresses to the German Nation.* Trans. R. F. Jones and G. H. Turnbul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Fischer, F. 1967. *Germany's Aim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W. W. Norton.

Fischer, F. 1991. *From Kaiserreich to Third Reich: Elements of Continuity in German History, 1871-1945.* Trans. R. A. Fletcher. London: Routledge.

Garrard, G. 2006. *Counter-Enlightenmen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ray, J. 2000.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Greenfeld, L.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ootunian, H. 2000. *Overcome by Modernity: History, Culture, and Community in Interwar Japa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rootunian, H. 2004. *The Empire's New Clothe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rschman, A. O. 1991.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Hobsbawm, E. J. 1987.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Hobsbawm,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 J. and T.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llinrake, R. 2010. *Nietzsche, Wagner and the Philosophy of Pessimism.* London: Routledge.

Holmes, S. 1993. *The Anatomy of Anti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untington, S.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Iggers, G. G. 1968.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Jacques, M. 2009.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London: Penguin Books.

Keohane, N. O. 1980. *Philosophy and the State in Franc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hn, H. 1967.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Collier Books.

Kohn, H. 1968. *The Age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Krieger, L. 1957. *The German Idea of Freedom.*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Levin, M. 1992. *The Spectre of Democrac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öwy, M. and R. Sayre. 2001. *Romanticism Against the Tide of Modern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Mah, H. 2003. *Enlightenment Phantasie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cMahon, D. M. 2001. *Enemies of the Enlighte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uyama, M. 1963. *Thought and Behaviou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x, K. 1975. *Early Writings.* Trans. R. Livingstone and G. Benton. London: Penguin Books.

Marx, K. and F. Engels. 1969. *Selected Works, Vol.1.*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Marx, K. and F. Engels. 1976. *Collected Works, Vol.5.*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Meinecke, F. 1972. *Historism: 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 Trans. J. E. Anders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 Paul.

Meinecke, F. 1984. *Machiavellism: The Doctrine of Raison d'Etat and its Place in Modern History.* Trans. D. Scot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Mommsen, H. 1996.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 Trans. E. Forster and L. E. Jones.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Mommsen, W. J. 1984.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1890-1920.* Trans. M. S. Steinberg.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jita, T. and H. Harootnunian. 1988. "Japanes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6,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P. Duu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11-774.

Nietzsche, F. W. 2000. *The Birth of Tragedy.* Trans. G. der Tragöd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nson, K. S. 1954. *Modern Germany: Its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Rorty, R.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rty, R. 1999.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London: Penguin Books.

Said, E. W. 1978. *Orientalism: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ri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rmondsworth: Penguin.

Said, E. W. 200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Said, E. W. 2004. *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akai, N. 1997. *Translation & Subjectiv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assoon, D. 1996.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London: Fontana Press.

Sen, A. 1997.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New York: Carnegie Council on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n, A. 1999. *Reason before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n, A. 2006. *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Sheehan, J. J. 1978. *German Liber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pengler, O. 1920. "*Prussianism and Socialism.*" in http://www.archive.org/details/PrussianismAndSocialism. Latest update 18 April 2010.

Stedman Jones, G. 1983. *Languages of Cla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Camelot Press.

Walicki, A. 1995. *Marxism and the Leap to the Kingdom of Freedo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ehler, H. 1985. *The German Empire 1871-1918.* Trans. K. Traynor. Leamington Spa: Berg.

Wolin, R. 2004. *The Seduction of Un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ods, R. 1996. *The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in the Weimar Republi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Young, R. 1990. *White Mythologies: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choes of the German *Sonderweg*?

The Issue of "Nationalism Against Citizenship Rights" in China

*I-chung Chen**

Abstrac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 conservatives came to advocate and celebrate what they called the German *Sonderweg* (special path). This ideologically laden phrase identified the uniquely all-powerful German state as the key to Germany's extraordinary rise. Correspondingly, the idea of equal citizenship rights was condemned as "Western" pollution or even "enemy of the empire." This paper, drawing on nineteenth-century German nationalism as a point of reference, reflects critically upon the current talks of the "Chinese model" or "Chinese road" and its "uniqueness." At the heart of the latter is, as will be argued, a species of "nationalism against citizenship rights" which share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original German version. The danger with such nationalism is, all too similarly, that it lends support to unrestrained state power and its continuing repression of legitimate claims of citizenship rights. Herein lay the seeds of a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crisis which might result in an ever more regressive state-nationalist regime in China. For all its "anti-West" overtone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nationalism against citizenship rights" comes dangerously close to the erstwhile German one. In rejecting citizenship rights as part and parcel of "Western modernity," so to speak, it endorses a full-blooded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stic" reactionary state-nationalism.

Keywords: China, Nationalism, Citizenship Rights, The West, Germany

---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E-mail: ic10006@gate.sinica.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